

# 从《劝学》篇看荀子的哲学思想

成都四中语文教研组

公元前三世纪，正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垂死的奴隶主阶级进行殊死斗争的决战时期。这种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就是儒法斗争的深入发展。荀子就是在这场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先秦法家杰出代表。

荀子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劝学》篇是他现存著作中的重要篇目之一。它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作者的教育观点，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作者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在不少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和儒家特别是当时儒家的正统——思孟学派最早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接间接地批判了它的一些主要反动观点，为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倒退，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的今天，教学《劝学》篇，对于进一步认清儒法斗争的内容和意义，进一步了解儒法两家不同的阶级实质，进一步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会有一定的帮助。

下面，我们准备就《劝学》篇和作者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谈几点体会。

## (一)

荀子《劝学》篇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他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天人相分”。

荀子在宇宙观方面最杰出的成就是他在与儒家“天人合一”和“天命观”等反动思想的斗争中，创立了“天人相分”的理论。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己的变化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不为之恶（憎恨）寒也辍（停止、取消）冬，地不为之恶辽远也辍广（阔）。”这叫做“天行有常”。“星坠木鸣”，“日月有蚀”，“风雨不时”，“怪星党（频繁）见（现）”，都是些自然现象，“无世不常有之”，与国家的盛衰、社会的治乱，以及个人的贫富、贤愚、死生、贵贱、祸福毫无关系。因此，“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圣人矣。”（以上均见《天论》）这些理论，对孔丘、孟轲等散布“畏天命”（《论语·季氏》）、“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等谬论来吓唬奴隶，使他们不再反抗奴隶主统治的罪恶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基于“天人相分”的观点，荀子认为国家之盛衰、社会的治乱，决定于领导者的是否英明和他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上明而政平”，国家就兴盛，社会秩序就安定，“上闇而政险”，国家就衰弱，社会秩序就紊乱。至于个人的贫富、贵贱、贤愚、吉凶、荣辱、祸福等，则完全决定于自己后天是否努力学习。所以《劝学》篇一再强调“学不可以已（停止）”，“学至于没（死去）而后止也”，只要活一天，就应该学习一天。他还认为“荣辱之来，必象其德”，“怠慢忘身，祸灾乃作”，“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因而“君子慎其所立乎！”“所立”，也就是“所学”。荀子还认为，人的才能“非生而具者也”，是后天才有的。君子并不能“遍能人之所能”，“遍知人之所知”。他举例说：“相（观察田地

的)高下,视(土壤的)稔(瘦)肥,序五种(因地制宜种植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贸易),相美恶(鉴别商品的质量),辨贵贱(定价格),君子不如贾(商)人;设规(画圆的器械)矩(画方的器械),陈绳墨(弹墨线),便备用(把房屋家俱制造得很精巧合用),君子不如工人。”(《儒效》)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学习,只要努力学习,就可以由“贱而贵”,由“愚而智”,“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谁)禁我哉!”荀子的这些思想,不仅彻底批判了孔丘、孟轲宣扬的什么“生而知之”(《论语·季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什么“天与”舜以“天下”(《孟子·万章下》)、“得之不得有命”(《孟子·万章上》)等一套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林彪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的反动实质。

## (二)

荀子《劝学》篇的理论基础之二,是他的包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性恶论”和“法后王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孟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荀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们所谈的人性,实际上是指他们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性。

孔老二吹嘘“天生德于予”,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轲的“性善论”就是从这里来的,并不包括奴隶在内。他胡说什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当有人问他“钧是人也,或为大人(奴隶主),或为小人(奴隶)何也?”他回答说这是“天之所与”(《孟子·告子上》)。孟轲既然认为奴隶主阶级的人生来就有善性,当然就不需要再学习了,只消把那固有的善性闭门“思之”(内省),“扩而充之”就可以成为圣人、君子了。至于奴隶主阶级中不善的人,那是由于外界的种种原因,使他“放(丧失)其良心”;如果要他好起来,只消“求其放心”(象家里跑掉的鸡和狗一样,只要把它们找回来)就行了。所以,孟轲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完全是美化奴隶主阶级、维护奴隶主阶级反动统治的谬论。

荀子系统地批判了孟轲的“性善”说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内省”说。荀子认为“人之性恶”。从他举出的“争夺”、“残贼”、“淫乱”等例证来看,说明他已经看出了当时剥削阶级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这倒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既然“性恶”,那末,“其善者伪(人为)也”,要由恶到善,就要进行教育(《劝学》篇中的“教”和“学”都是这个范畴)。其次,荀子还比较注意环境习俗的影响,指出:“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这)非(不是)天性也,积靡(顺其积习)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措置),慎习俗,大(重视)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儒效》)《劝学》篇里的“所系者然也”,“所立者然也”和“所渐者然也”,都是反复讲这层意思。所以他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为的是“防邪僻而近中正。”另外,荀子还很强调“积”累的功效。他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儒效》)在《劝学》篇中,也强调“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由此可见,荀、孟的两种“人性论”支配着两种教育观。孟轲鼓吹“性善”,从根本上否认了教育的作用;荀子在“性恶”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原则。恩格斯指出:“在

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褻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恩格斯这段评论，也完全适用于对荀、孟之间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的争论。

《劝学》篇里有一句名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的这个观点，是以他唯物主义的进步史观和政治主张“法后王”为基础的，是同孟轲“法先王”的复辟、倒退谬论针锋相对的。

历史是前进的。“今”一定要胜过“昔”，后代一定要胜过前代，学生一定要胜过先生，新生力量一定要战胜腐朽力量。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承认和否定这个客观规律，是前进和倒退、进步和反动的分水岭。

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面对着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汹涌潮流，发出了“今不如昔”的哀鸣，什么“世道衰微”、“天下无道”呀，什么“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今之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呀，总之，一代不如一代。孟轲主张“法先王”，就是和孔老二一样，要复辟殷周奴隶制，搞历史的大倒退。

荀子从理论上深刻地批判了孔孟的这些谬论，痛斥他们是“呼先王以欺愚者”（《儒效》），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非相》）。荀子说的“后王”，就是建立了地主阶级专政的“当今之王”。在“法后王”理论的指导下，荀子虽然也主张学习“先王之遗言”，但他十分强调用现实去检验，批判地吸取，赋予新的内容，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劝学》篇中关于“礼”的概念，就是一个证明：“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这就给“礼”加进了“法”的新内容，使其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服务。

《劝学》强调“学莫便乎近其人”，就是说最好的学习方法在于直接向现实生活中合乎标准的人学，而不是向“古人之糟粕”——典籍学；荀子虽然也列举了《礼》、《乐》、《诗》、《书》、《春秋》这些可资诵读的“课本”，但他又明显地指出了这些“课本”各自的缺点，教人既不要割断历史，更不能迷信古籍。他之所以也重视儒家的这些经典，实在是有着如清儒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这样的看法，带着取之于古而用之于今的目的。这正是“法后王”的进步历史观在教育上的具体运用。这与梦必见周公，言必称尧舜的“法先王”的孔孟根本不同。《劝学》中所体现的“法后王”的教育思想，既早在二千年前就抨击了孔家店顽固守旧、克己复礼的教育观，同时也是对二千年后妄图效法古圣先王，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孔老二徒子徒孙林彪一伙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

### （三）

荀子《劝学》篇的理论基础之三，是他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劝学》十分强调：要知道天有多高，就必须登山；要知道地有多厚，就必须临深溪；要学习“君子”的学问，最便当的莫过于接近“君子”其人。这表明荀子十分重视接触实际。

荀子认为，认识客观事物，首先依赖于人的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他说：“耳、目、鼻、口、形（身体），能（能够）各有接（接触或感知）而不相能（代替）也，夫是之谓

天官（感觉器官）。”（《天论》）因此，“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正名》）

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荀子叫做“征知”，就是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他认为“征知必将得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正名》），就是说要有感性材料为依据。用什么来进行“征知”呢？他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心”就是指“大脑”，就是要进行思索。《劝学》中所说的“思索以通之”，就是这个意思。荀子还认为，只有经过思维活动，才能别同异，定然否，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外物所蔽（迷惑）。例如，从山上看山下的牛，只有羊那么大，但找羊的人不会下山去牵别人的牛；从山下看山上的树木，只有筷子那么小，但是找筷子的人决不会上山去砍树，因为他们经过思索后知道了“远蔽其大”和“高蔽其长”的道理（《解蔽》）。

荀子在理论和实践，即“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虽然十分重视“知”，但却比较更注重“实践”，更注重“行”。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儒效》）他把“闻”、“见”、“知”、“行”逐级比较，而以“行”为最高。但他最后说的“学至于行而止矣”却是不对的。荀子还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还须通过实践进一步检验和发展认识。荀子这里所说的“行”，虽然主要是指个人的“行为”、实践；但我们认为也多少包含了一些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社会实践内容。例如《劝学》所说的“善假于物”，《天论》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似乎都已经超出了个人实践的能力，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即荀子所谓“能群”（《王制》），才能办得到。

由于荀子重“行”，重“实践”，所以他在“听言”方面，也重“征验”，贵可行。《性恶》篇说：“善言古者必有节（验证）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验证）于人。凡论者贵其辨合、有符验（言论与实际相符合），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意即起而可行）”（《性恶》）。这里说得很明白：古代的东西（包括《劝学》篇所说的《诗》、《书》、《礼》、《乐》、《春秋》等“先王之遗言”），只有被“今”天的情况证明是正确并可以为“今世”所施行的，才有价值；宇宙变化的理论，只有被人们的生产实践所证明其正确，并为人们的生产斗争服务的，才有价值：一切理论，都必须受实践的检验。正确的理论，不仅是坐下来谈得头头是道，更重要的应该是能够指导实践。因此，荀子认为，“知之而不行，虽敦（多）必困”。（《儒效》）正是基于这些见解，在《劝学》篇中，一则强调不仅要“博学”，而且要“参”（这里的“参省”与曾子的“三省吾身”不同，曾子的“三省”是脱离实际地做内省功夫，荀子在这里说的“参省乎己”，应如清人俞樾所解，“参者，验也”，而“省乎”二字为后人所加。“参己”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对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加以检验，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知明而行无过”。再则强调“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这“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就是说的“行”。如果不“行”，仅仅“入乎耳，出乎口”，那就是“小人之学”。三则讽刺那些不以“君子”作为榜样，努力使自己成为“君子”，不以“礼”（法）作为标准，改造社会，而只是“学杂识志，顺诗书”的人为“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

重视客观实践或重视内心反省，强调学习要结合实际或者主张学习脱离实际，开门办学或关门办学，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两种对立的认识论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反映了儒法两家在教与学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从子思的“三省吾身”到董仲舒的下帷求学，目不窥园，以及宋儒的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无一不是根源于孔老二的反对实践，反对学习要结合实际，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反动教育思想，其目的是为反动的剥削阶级造就奴才，

# 《华德焚书异同论》浅析

川师附中 邓元燧

《华德焚书异同论》是鲁迅后期杂文的代表作之一。本文写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副刊《自由谈》，后由作者编入《准风月谈》。

## (一)

一九三三年，是形势急剧变化，国际上和国内法西斯主义猖獗一时，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一年。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下窃取了国家政权，担任了政府总理，并自称“国家元首”。他对外勾结各国的法西斯势力，实行武装侵略；对内则加强国社党的法西斯统治，建立军事特务组织“冲锋队”和“党卫军”，实行白色恐怖。

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他不但聘请德国的法西斯军官塞克特充当他的军事顾问，请德国的警察所长传授法西斯特务统治的经验，甚至还把他的儿子蒋纬国送到希特勒那里去“留学”。蒋介石集团公然以希特勒为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以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他们进一步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妄图扼杀革命力量，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罪恶统治。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围剿”。一九三三年四月，又效法希特勒的国社党，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和“力行社”（即“中统”、“军统”前身）。与此同时，还加紧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查禁进步书刊，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

培养社会上的寄生虫。林彪一伙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贩卖“三脱离”的黑货，叫嚷“理论要多，教材要厚，下乡要少”，恶毒地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什么“变相劳改”，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 结 语

荀子生活的时代，社会正在急剧变革，阶级斗争特别复杂。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便是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谓“百家争鸣”，就其当时所代表的主要阶级力量来看，不外三家，即奴隶主阶级一家，奴隶阶级一家，新兴地主阶级一家。从世界观的范畴来看，实际上仍然只有两家，即唯物论一家，唯心论一家。其中最主要的，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

从荀子的个人经历来看，他虽然早期受学于儒家，但后来游学“稷下”，接受过各家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尤其是游历秦、楚、赵等国，实际考察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成就，因此，他能够从儒家的旧营垒中杀出来，成为先秦法家的一个杰出代表。在现存的《荀子》书中虽然还可以看出儒家影响的残余痕迹，但并不能掩盖他整个思想的光辉。弄清这点，才能深刻地理解《劝学》篇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及其历史意义和当前教学本文的现实意义。